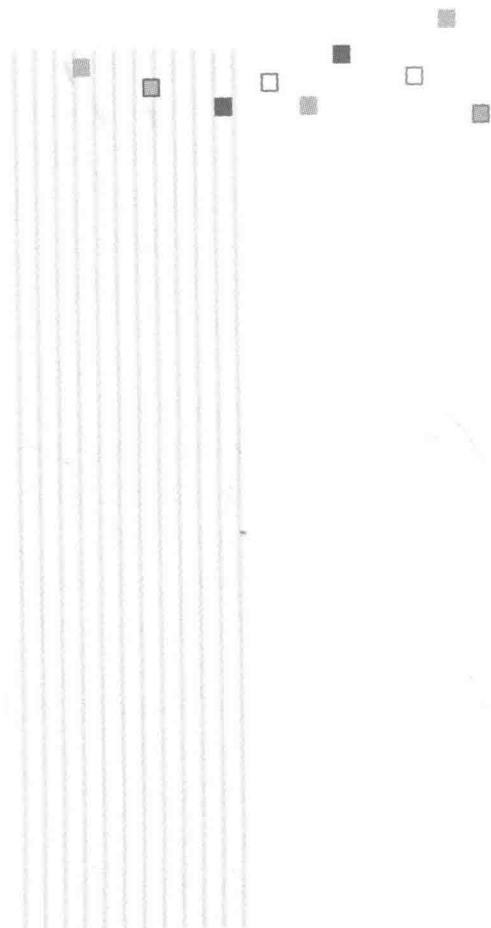


第一编 从原始的历史意识到 史学思想



第一章 绪说

第一节 民族文化与史学思想

史学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要从时代学术大背景下进行思考。

史学思想的研究是振兴民族文化，振兴民族史学的需要。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在大变动的社会中，包括史学在内的民族文化经历了大动荡。学科同样经历了重大的变化，或说是从古代学术向近代“转型”，或说是学科上“重组”，还有的说是对古代文化“经史子集”的学问来一次“推倒重新洗牌”。这些提法是否恰当，可以讨论，但从中我们可以体察到文化上的大变化带来的学科变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作为理论性较强的史学思想的学科，本身就是这种大动荡的产物，这一百多年的学科历史留下的思考，对发展新世纪的史学很有启迪。

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外来思潮涌入中国，中国学人努力学习，对传统的文化进行熔铸，努力参与世界范围内理论上的诸子争鸣，寻找振兴中国文化的途径。

一百多年来，史学发展深受西学的影响，史学走上近代化或者说现代化的道路。从世界范围说，近代西方学术处在强势的地位，他们在理论的阐述上，也是表现出一种“话语”的强权^①。

一百多年来，我们大多数史家基本上是按照西方史学理论的命题、框架，重新解读古代传统史学，进而去思考、争论、写作和研究。例如：

——什么是历史？

——什么是历史真实？

^① 关于“话语权”的问题，经济、外贸、网络、媒体方面人士议论得较多。近年来，包括史学在内，文化的话语权问题也开始为人们关注。

- 史学家能不能反映出过往的历史？
- 史学学科是怎样的一门学科？
- 历史学是不是科学？历史学是艺术，还是科学？
- 历史研究法的特点是什么？

.....

围绕这些问题，引发出的相关问题就更多了：历史是进化的，还是退化或循环的？历史的主体是什么？历史可不可以认识？历史可不可以提供借鉴？历史学有没有存在的理由？等等。

纷纷扰扰，一百年来中国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写出不少宏论，提出无数答案，他们的思考是认真的，其中不乏精见。通过讨论，学者们开阔了视野，深化了思维，为传统史学的解喻提供了新的切入点；由此引发各种争论，形成各种史学思潮、流派，这些是在古代史学史中不曾见到的景观。

集中讨论这些问题的著作，大致可以归结为三种：一是史学通论、史学概论、历史哲学类；二是历史研究法一类；三是中外史学史一类。相关的论文数量很多，另外，其他各类史著中，也有涉及类似议题的内容。

中国史学家渴求新知，在这些重大史学理论问题上，竞相展示自己的才华，提出各种看法；但另一个普遍现象是，中国传统史学原有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被冷落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在学术领域内没有机会得以展开系统的讨论，表现出民族史学话语权的失落。例如：

- 究天人之际的思想；
- 历史发展大势的论述；
- 历史盛衰论的通变思想；
- 民本思想；
- 实录、直笔论；
- 史书的体裁、体例论。

.....

这些问题涉及宇宙观、历史本体问题、历史运动问题、历史认识问题、史料学观点、史书编纂方法问题、史学社会功能问题等。这些重大问题的讨论，难道没有意义吗？但是，这些问题在西方思维方式的理论框架内，很难展开讨论。

一个多世纪来，我们有一些史家在自己的著作中讨论过上述问题，但

总体来说，实在不对称。这不能不引发我们很多思考：

——几千年中国史学有没有思想？

——中国民族史学的认识对于当代史学发展有没有价值？

——在 21 世纪，中国史学要走向世界，寻找发展途径，民族传统史学思想的遗产真的是毫无作为？难道只有靠西方学人的理论，中国史学才能找到出路？

——这些问题，近代中国史学家讨论过，但没有成气候，这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中国近代，有的史家从民族史学理论中，从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学术中，挖掘出有价值的认识。他们的成功与不足，甚而出现的某些谬误，都为我们的进一步讨论打开了思路。我们重视结果，更重视近代学人在建构近代史学学科上，努力参与世界范围诸子争鸣的精神。

中国学人向西方学习很用功，相当谦虚，一百多年来，中国学人走向世界，寻找思想武器，在输入西学上，做出的业绩相当惊人^①。中国学人为了翻译西方学术名著，有的穷尽了毕生精力，有的师生数代人不断努力，所以做出了很大的成绩^②。例如，何炳松在译介、述编西方史学史、历史研究法等方面，做的工作就相当辛苦，也有成绩。这些工作对发展民族史学

① 以商务印书馆为例，据有关资料，1902 年，张元济先生进入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译所所长以后，以开发民智、传播科学文化为主旨，积极组织翻译出版世界名著。仅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译著，包括蔡元培所译科培尔的《哲学要领》等，在两三年内就印行了九十多种。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初，《名学浅说》已印行十一次，《天演论》更印行了二十次之多。1921 年，王云五先生接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继而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后，此项译事更大有进展，逐渐形成系列，并汇编为《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在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两辑《万有文库》中，就有《汉译世界名著》二百余种。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介绍国外学术文化的工作逐渐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制订了《外国名著选译十二年规划总目录》，于 1956 年开始实行。1957 年商务印书馆恢复独立建制，此后拟订了《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选译目录》，共选书 1614 种左右。到 1966 年，已出书近三百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展，商务印书馆的译介世界名著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初，商务印书馆开始分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为系统地了解、研究各种思潮和各种流派，更好地进行学术文化积累，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如果加上各地各类出版社翻译的西方学术著作，总数在千种以上。

② 我们只要读一读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4 卷本《柏拉图全集》的“中文版序”“中译者导言”，就会相当感动。

是同样重要的，今后还要继续做好。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史学研究面向世界，译介西方史学理论及方法论专著和文集的相当多^①，有一批重要作品^②。

此外，中国学人用中文写出一批研究西方史学史、欧洲史学史及历史哲学之类的专著，还出版了一些相关的文集。这些作品对开阔学人的眼界很有益，并且新的思潮、新的观念被介绍进来。有关的史学理论问题的学术讨论成了热门议题，但现在的问题是：

——20世纪重视翻译、介绍中国民族史学思想、史学理论著作的西方学人，有几人？

——就是我们自己的学人，把中国史学向世界介绍的有几人？我们学贯中西的学人，在译介西方学术作品的同时，能以一定的精力向世界传播中国传统史学的，又有几人？

——难道中国真的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历史大国”？

我们古代先贤讨论的重大史学理论命题，自然更不可能被放到桌面上来。综合这些现象，我们认为，到了近代，中国民族史学的话语权失落了，说得好听一点，是话语权转移了。

① 参见于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张广智：《近二十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1978—1998）》，《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4期。此前有刘泽华主编：《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籍提要》，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等。

②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李凯尔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汤普森《历史著作史》和杨生茂选编《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等。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勒高夫《新史学》、茹科夫《历史方法论大纲》和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等。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巴尔格《历史学的范畴和方法》、米罗诺夫《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伊格尔斯主编《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哈多克《历史的思想导论》、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和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有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勒高夫等主编的《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汤因比《历史研究》，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以及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有德雷的《历史哲学》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有维柯的《新科学》等。

通过对百年以来历史学科发展史的回顾，希望能激发起我们进一步研究西学与传统史学的愿望，希望我们不光能输入外国史学，而且还能在研究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史学思想上下功夫。并且，我们还应把中国丰富的传统史学思想理论推向世界，进而在新的高度上建设我们民族的历史学。传统史学思想的价值是明显的，我们在后面相关的章节中还要讨论，这里可以先举出几点来：

——历史变化的“趋势说”。在认识历史过程发展上，在认识全球化趋势上，这样的学说都具有重大意义。从韩非到马端临、王夫之，他们对这一理论都有重大贡献。

——历史盛衰论。历史本身就是盛衰变动的，盛中有衰，盛衰相互连接，衰可以复盛。一国一民族的盛衰又和周边乃至世界的盛衰变动相互联系。与此相关的是历史运动的通变观。时代不断发展，一个时代的历史经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因此，借鉴历史总是和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要注意现实的变化。

——民本思想。认识历史变化与社会变革中的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理念，以及这些观念在当前时代下具有的价值。

——风俗人心关乎社会治理与安定的观点。时代的风俗是一件大事，风俗状况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社会和谐的风向标。

——关注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历史忧患意识。每一时代的史学家、学人，总是系念着民族的兴衰荣辱，具有时代的责任感。

——天人相关的思想。历史发展总是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孤立地看社会发展要求，而忽视环境的因素，一定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在史学工作上，还有历史学的编纂思想与理论。刘知幾的《史通》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中的论述，今天仍然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此外，还有史料整理与考辨的方法论、历史文献学思想、历史文学的理论和历史教育思想等。

史学思想史研究，不只是史学问题，还是一代学术发展、社会发展要思考的专题。本书对上述问题在相关的章节会提出自己的思考，下面先初步提出四个方面问题做一些说明，进而帮助我们理解史学思想研究的意义。

一是天人关系的问题。这是历史的根本问题，是涉及宇宙观、历史观的问题，讨论这一问题对于理解“什么是历史”或者说“何谓历史”之类的问题，能有更好的解喻，观察问题的视野也会更开阔。离开宇宙发生而局限在“人事”方面，要对普遍的“历史”有准确的理解，难以办得到，往往只好

偷换概念，把“什么是历史”的争论，换成“什么是人的历史”，或者“什么是有文字以后的历史”。逻辑的“同一律”在争论中也被置之脑后。

天人关系的讨论，表明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分不开，生态、环境、资源、地理等，其中任何一项，都会影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至于全球历史的发展。

早在汉代，司马迁就把“究天人之际”，作为史家第一项大任务提出来。西方还说中国民族史学没有思想，没有历史意识，真不知从何说起。

二是历史盛衰的问题。历史盛衰的问题，同样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中国史学家研究历史的基本点。历史是一个盛衰变动的过程，盛衰不断变动，又相互包含，见盛观衰，这些对于世界史学都是有贡献的。无论是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乃至妇女史、环境史、风俗史等，都是在观察这个天地内的相关事项的变动，用英文比较形象的说法，是“ups and downs”（上升与下降）。历史事物总是在这样的态势下表现出来，人们不断思考，从中得出有益的认识，事情就是这么清楚地展现。

三是学术创新思维。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创新的意识得到最清晰地表述，提倡“成一家之言”和“独断之学”的精神，并且指明了创新的途径。

司马迁在记述其父的《论六家要旨》时，以《易大传》的学术基本思想，作为他的学术信念：“《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学迅速成为一门发达的学术，与这种融会各种学术而成一家之言的创新精神，是有关系的。有的西方学人说中国史学中“没有历史意识，没有思想，除偏见之外，大约他们没有读，或者压根读不懂中国史学名著”。

四是忧患意识。这是推动民族向前发展的清醒意识，也是史家的时代感与责任感的体现，是历代史家从事史学工作的出发点。

上面提到的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史料学思想、史书编纂法、历史教育思想等，这些用我们民族传统史学话语表述的思想理论，难道没有价值？不值得讨论？

为了建设 21 世纪的史学，在吸收世界上先进文化的同时，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要重视民族史学思想的研究，吸收世界上各类有益的思想理论，使民族史学大步走向世界。

一百多年来，中国史学家充满民族感情，渴望史学为民族振兴贡献力量，渴望民族史学振兴。1902 年，梁启超写的《新史学》就是为进行史界革命而写的檄文。在总结出旧史学的弊与病之后，他说：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①

梁氏提倡的新史学从表面上看，是否定传统史学，但其立意是希望以新史学作为救国的途径，把新史学作为振兴民族的大事。

何炳松在1927年出版的《历史研究法》中指出，即使是历史研究法，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也是值得称道的，不必妄自菲薄。他说：

唯吾国史籍，虽称宏富，而研究史法之著作，则寥若晨星。世之习西洋史者，或执此为吾国史家病。殊不知专门名家之于其所学，或仅知其然而终不知其所以然，或先知其然而后推知其所以然。此乃中西各国学术上之常事，初不独吾国学者为然也。西洋史家之着手研究史法也，不过二百年来事耳。然如法国之道诺(P. C. F. Daunou)，德国之特罗伊生(J. G. Droysen)，英国之夫里门(E. A. Freeman)辈，或高谈哲理，或讨论修辞，莫不以空谈无补见讥于后世。至今西洋研究史法之名著，仅有二书。一为德国格来夫斯法尔特(Greifswald)大学教授朋汉姆(Ernst Bernheim)之《历史研究法课本》(*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出版于一八八九年(清光绪十五年)。一为法国索尔蓬(Sorbonne)大学教授郎格罗亚与塞诺波(Ch. V. Langlois and Ch. Seignobos)二人合著之《历史研究法入门》(*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出版于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两书之出世，离今均不过三十余年耳。

吾国专论史学之名著，在唐有刘知幾之《史通》(中宗景龙时作)，离今已一千二百余年。在清有章学诚之《文史通义》(乾隆时作)，离今已达一百七八十年。其议论之宏通及其见解之精审，决不在西洋新史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九第7页。

学家之下。唯吾国史学界中，自有特殊之情况。^①

他在《通史新义》中又说：

吾国近年来史学界颇受欧化潮流之激荡，是以努力于通史编纂者颇不乏人。其对于西洋史学原理之接受，正与一般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新文学家同，一时顿呈饥不择食活剥生吞之现象。偏而不全、似是而非之通史义例因之遂充斥于吾国现代之史著中。……一时学说纷纭，莫衷一是；大有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之概。诚不可谓非吾国史学界复兴之朕兆也。^②

在中西文化碰撞之下，他看到“史学界复兴之朕兆”。他希望在“若干年后，民族复兴，国家安定，文化工作日新月异，我如能和高佣先生、各位教授以及各位学生，促膝围坐，清茶淡酒，纵谈史学，回话当年，那末，我们目前所身受的一切艰苦都已得到无价的心灵的快慰了！”^③

同时代的学人李则纲指出，史学应当适应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要使中国民族史学进行更新，开新局。他说：“……现在的世界。正急向转型方面趋走，许许多多的学问，固然发生动摇，而最难支危局的，更莫如历史学。我们知道历史这件东西，曾做过上帝和僧侣的傀儡，曾充过帝王和贵族的侍役，曾被颂为帝国主义者的护符。然而时代的转轮，已准备把历史学过去的一切劳绩和光荣吞噬下去了。历史学旧有的产业和荣誉，既势难持续；就历史学本身讲，也应和转形期的时代协调，另辟新的局面，肩起人类最大任务，为社会作学术的前锋。”^④

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说：“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智识，其要在此。”^⑤

① 何炳松：《何炳松文集》，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5页。

② 何炳松：《何炳松文集》，第4卷，第86页。

③ 何炳松：《何炳松文集》，第2卷，第704~705页。

④ 李则纲：《史学通论·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序》第1、2页。

⑤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引论》第3页。

有一个重要问题要提出来。近代史家有不同的主张、不同的流派，但总体上说，振兴民族史学是共识。可以以柳诒徵为例，有文章指出，“柳诒徵之所以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其用意在于希望能以此恢复民族的自信心，可见他仍希冀以思想文化的方式，解决当时的外患问题。……柳诒徵提出中国文化的特质，如能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加以分析，或许比较容易触摸到事实的真相，而非表面上的传统与西化之争”^①。

中国学人渴望振兴民族史学，还体现在对西方学人曲解、贬损中国民族史学言论的抗争。

近代西方学者中很多人，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曲解、贬低，他们认为中国的历史典籍是丰富的，但没有史学思想。可以说这是二十世纪西方流行的见解。他们的议论，引起中国史家的不满和愤慨。很多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感受更深，反映也最为强烈。

20世纪60年代，杜维运在英国剑桥大学问学期间，留心中西史学的比较，撰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一书，这是中国史学家全面系统地与西方学者就中国史学进行对话的专书。

作者把西方史学家分成三类，分析了这三类史家对中国史学的态度。第一类是所谓的西方正统史学家，“在欧洲，治欧洲史以及欧洲国别史的史家，往往被视为正统史家(academic orthodox historians)”。这一类史家观念褊狭，历史的视线不够广阔，欧洲以外的世界及其历史，在他们的心目中不占重要地位。西方正统史家论及中国史学，是极尽蔑视嘲弄之能事，偶尔也有称赞的语句，但很少能触及中国史学的精华。^②

第二类是西方非正统史家。所谓非正统史家，是“治亚洲、美洲史或非洲史的西方史家”。这些史家视野比较开阔，观念较西方正统史家开明，但

① 彭明辉还说：“‘五四’时期的学术思想本来即存在矛盾之吊诡，以反儒学传统为中心的讨论，往往忽略了‘五四’人物反儒学之终极目的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在反儒学传统与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彭明辉：《柳诒徵与〈史地学报〉》，柳曾符、柳佳编：《劬堂学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245页。

② 这些史家有汤普森(J. W. Thompson)、理查森(Alan Richardson)、艾尔顿(G. R. Elton)、卢克斯(John Lukacs)、浦朗穆(J. H. Plumb)、葛兰特(Michael Grant)、马尔威克(Arthur Marwick)、白特费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等。参见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版。

他们对中国史学了解得很少。^①

第三类是西方汉学家。杜维运以为，这些汉学家有学术上的宽容，而又略具基本知识，是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他们论中国史学，有时能发表极为珍贵的意见。^②

一些西方学人即使在谈到中国古代史学具体问题时，也是带着傲慢与偏见。他们认为，古代中国人主要从事于农业及手工业，简单的生活使中国人对历史的态度出现了问题，即他们所谓的“寂静主义”^③；也就是说，中国民族史学没有活力，没有思想。到近代，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不少，但“中国学者受西方历史的特殊训练者，绝无仅有”。所以欧洲人、美国人、澳洲人、日本人，甚至非洲人都能写出中国历史书，但中国人却不能写出有水准的西洋史，“可几于大学或研究水准者，真如凤毛麟角”^④。

杜维运在《中国史学史》第三册中再一次阐明自己的心愿，他在这本书的结篇中说：

① 这些史家有奈芬司(Alan Nevins)、瓦尔班德(T. W. Wallband)、巴容(Jacques Barzun)、卡耳(E. H. Carr)、魏吉瑞(A. G. Widger)、巴拉克劳甫(Geoffrey Barraclough)、麦尼耳(W. H. McNeill)、傅尔(N. E. Fehl)、但斯(E. H. Dance)。

② 中国史学是西方学者所谓的汉学中的一项，如早期的法国的沙畹(Edward Chavannes)等。在1961年编纂的《中日史家》(*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一书中论及的学人有：浦立本(E. G. Pulleyblank)、毕斯利(W. G. Beasley)、房德龙(Van der Loon)、何四维(A. F. P. Hulsewe)、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福赫伯(Herbert Franke)、杜希德(D. C. Twitchett)、戴密微(P. Demiéville)、哥芮(J. Gray)、白乐日(E. Balazs)以及瑞特(Arthur F. Wright)等。

③ 中译文见杜书第119~120页；英文原文见杜书第130~131页：Throughout their history the masses of Chinese have been occupied with agriculture and handicrafts. Their lives have been essentially simple and it is from this standpoint that we may understand their attitudes to history... The Chinese attitude to history may be called Quietist. (A. G. Widger, *Interpretations of History, From Confucius to Toynbee*, 1961, p. 15, p. 18.)

④ 中译文见杜书第124页，英文原文见杜书第135页：There are hundreds of books on Chinese history written by Europeans, Americans, Australians, Japanese and even Africans. There are very few indeed authoritative studies in Western history by Chinese on the university or research level. (N. E. Fehl, "Introduction: Some Problems in the Relation of Chinese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in Sir Herbert Butterfield Cho Yun Hsu & William H. McNeill on Chinese and World History, p. 8.)

平情而论之，中国史学自有其缺陷，然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史学遥遥领先西方史学，是不争的事实。十九世纪以后，西方史学进入黄金时期，中国史学趋于式微，也是史学的潮流。当今之时，中国史学界以广阔的胸襟，恢宏的眼光，综合中西史学，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则超越的宏观的与美善的史学，将悠然而出现。经世的大业，不朽的盛事，尽在于此，愿与国人共勉之！^①

这里还应当指出，20 世纪的 80 年代，汪荣祖在中西史学比较上，扎实地进行探索，他出版的《史传通说》是以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篇中的史学思想作为主干，进行中西史学比较。可以说，这是以中国民族话语，进行中西史学比较的第一部专书。作者于 2002 年又出版了《史学九章》，这本书后面的几章对中国史学进行了深入研究，第五章是《西方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解与误解》，全面评述了西方学人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注意从史学的属性讨论问题。他批评西方学人把中国传统史学简单地归为“儒家史学”，又认为这种史学从属于政治，是道德的工具，史学没有独立品格，因此也就没有西方的“史学意识”。这些言论表明：

近代西方独霸世界，在学术圈里也不免有文化的天朝观，认为一切现代学术的根源都在西方，所有非西方学术，莫不属于前现代的古文明。所以，不少著名的西方史学家，虽不曾真正接触到中国传统史学，就信心满满地说，历史意识(historical mindednes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乃西方独有的东西，故史学史必须追溯到希腊与犹太之根，无论印度或中国皆属“无史”(ahistorical)。有不少西方史家认为，西方人到 19 世纪之具有近代史学意识，就像他们于 17 世纪已具备了科学意识一样，而亚非文明在过去既无历史意识，至近代欧化，才接受了近代西方科技，以及获致近代西方的史学意识，并以欧洲的史学概念与名词来重新规划亚非国家的历史。^②

西方学人学术偏见是“西方独霸世界”意识的体现，“在学术圈里也不免有文

^① 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 3 册，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版，第 529 页。

^② 汪荣祖：《史学九章》，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36～137 页。

化的天朝观”，通过“史学话语权”表现出了文化上的霸权主义。

西方史家对中国民族史学的扭曲，具体一点说，主要有：一是史书“主观的褒贬有违客观”；二是“御用史官替政治服务，失之真实”；三是“编抄史书无异剪贴簿，枯燥无趣”。汪荣祖逐项作了评述，指出以西方现代史学标准来评论中国传统史学，存在偏见。对中国传统史学，“西方史家看不清庐山真面目，只恐庐山仍在云雾缥缈间”^①。

总之，振兴民族史学，推进民族史学走向世界，是海峡两岸绝大多数学人的共同心声。

第二节 史学思想、史学理论与史学思想史

史学本身又是一门历史的学科。古代的“史”，与近代的“史学”，有联系又不是等同的概念；古代史学思想和近代的历史哲学有联系，但并不是一回事；传统的史学思想与近代的史学理论有联系，也不能等同。在史学史上，中外的历史思维相通又不尽一致，有些地方的差异相当悬殊。以西方历史哲学的概念、范畴，来总结中国史学思想，可以有新的解读，打开新的思路；但由于思维的特点不一样，也会出现削足适履的情形，甚而得出错误的认识，认为中国传统史学没有思想，当然是说如同西方那样的历史哲学式的史学思想。从民族史学的实际出发，总结丰富的民族史学的思想，可以把握民族史学的特点，可以较好地进行中外史学比较，可以更好地评价中国史学在世界上的地位。研究中国史学思想，可以清楚表明融会中西史学，对于发展当代史学的重要性。

到了近代，中国史学明显受到西方史学的影响，传统的史学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专门的史学理论著作产生了，相关命题的讨论放在史学思想范围内研究，更有新解。应当注意的是，传统史学的相关论点、命题本身的含义，在讨论时，把问题放在史学思想的长河中进行研究，更可以看出其中的继承与流变。

史学思想史的研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需要。

为了振兴民族史学，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并且和民族历史、民族史学的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离不开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吸收。传统史学思

^① 汪荣祖：《史学九章》，第161页。

想和方法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郭沫若、侯外庐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传统史学研究上有重要成就，对传统经学、子学的研究也是突出的。郭老对《周易》的理解，从思维定式方面论述了古代《易》学的成就，沟通了《周易》辩证思维与黑格尔的辩证思维。范文澜先生的经学成就是突出的。郭老的先秦诸子研究是他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管子集校》在《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中占了相当大的篇幅。侯外庐一生四度研究老子思想，前后经历了二十多年^①。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史学事业。郭沫若说到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时指出，他没有离开罗振玉、王国维二家的业绩。侯外庐先生在《韧的追求》中说到他自己的创造，一个重要方面，是乾嘉学者治学传统与成果对他的影响，但他又不是盲从古人。“我之所以一向欣赏乾嘉学派的治学严谨，一向推崇王国维的近代研究方法，而未至于陷入一味考据的传统，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便在于《资本论》方法论对我的熏陶”^②。这说明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传统史学思想方法结合起来，对于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多么重要。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白寿彝先生发表了《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四篇，以及其他一系列论著，系统地阐发了他对史学遗产的见解，论述了中国古典史学中的优良传统在我们新时期史学建设中的价值。这其中包括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以及历史文献学和历史教育等。他领导当代中国学人完成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正是他这一思想的落实。除了思想内容外，这部著作采用的新的综合体裁，也是在批判吸收中国纪传体史学体裁的长处后形成的。白寿彝先生的史学实践，实际上是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历史教育各个方面，全面地批判总结传统史学遗产，探讨中国史学的民族特点。

20世纪以来，传统史学的命运，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这就是民族史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可以得到新生，生出新的活机，而新时期的历史学也只有充分地吸收民族传统史学的精华，才能适应新的时代需要。我们把中国史学放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研究，重新审定中国民族史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为的是继承民族史学优秀传统，增强民族自信心，建设有民族特色的新史学，使史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① 参见侯外庐：《韧的追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76～277页。

^②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91页。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注重从文化史角度审视史学。吕振羽指出，在对待文化传统上，有两种倾向要反对：一种是所谓的文化贩运主义；另一种是文化闭关主义，即文化上的排外主义，或者说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新史学家要以世界史的眼光对待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他说：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要“迎头赶上”，不再走欧美所走过的道路。这对于我们的民族新文化来说，便将不同于欧、美、日本资本主义的文化，将是比它们进步的一种新型的文化。^①

“迎头赶上”便是我们解决这一矛盾问题的实践方针。吕振羽借用孙中山的话，就是要使我们民族文化“迎头赶上”，从而把文化的开放与先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今天重读这段话，我们仍然能受到很大的启发。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创造自己的新史学，重视史学的民族性。在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经验时，白寿彝先生指出，李大钊、郭沫若与侯外庐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中具有开创性地位。他称赞侯外庐的建树，强调他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民族化”上的贡献，说：

外庐同志的书，在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地位中应有它的特殊地位。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出版了很多，史学界的几大家都已出来，并有不同的著作、不同的贡献。但有一点，外老是突出的，这就是，他研究中国历史是想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也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民族化。这一点很重要。别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历史结合起来，但是把中国历史特点抓出来，这在外庐同志是最突出的。^②

在纪念侯外庐同志的会上，白先生说：“我们今天纪念外庐同志的学术成就，……应该把他创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化的工作继续下去。”^③总结

① 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62页。

②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页。

③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416页。

好我们民族史学遗产，研究史学史，进而建设好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振兴民族史学，走向世界的正确的道路，他说：

……要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要站在世界前列，不能一般化，真要拿出东西来。我们国家的历史最长，史学一向是最发达的，现在不应该落后，应该大步往前走。^①

我们要努力吸收国外优秀的史学成果作为我们创新史学的借鉴。20 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受到西方以及稍后苏联史学的影响是明显的，这种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地区主要是受到苏联史学的影响，由于种种原因，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史学交流可以说基本中断了。进入到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这一情况得到根本的改变，中国史学获得新的活力。但如何把世界上的有活力的思想和民族史学的实际结合起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这个问题不解决，直接影响 21 世纪民族史学的建设和发展。因此，一定要从时代的高度研究民族史学思想。

重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研究，进一步发掘史学的民族精神，特别是在 21 世纪全球化趋势下，努力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坚持和发展包括史学在内的文化民族性的品格，是十分迫切的任务。

当代中国史学问题，至少有两点要考虑，一是史学的时代性，二是史学的民族性。这是 20 世纪史学的两个焦点，也是 21 世纪全球化趋势下，史学发展的两大中心问题。

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是相互影响的，因此，应当把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起来思考，讨论中国史的进程，认识中国史发展的大趋势，讨论历史学建设问题。

史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史学观念更新，带来的是历史学大发展。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要站在世界前列。我们认为，要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努力发掘民族史学思想的宝库，吸纳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史学理论，建设出民族的、科学的、时代需要的史学理论。这就是结论。

史学思想研究的对象，史学思想研究的内容很丰富，归结起来，是两个部分：一是史家(包括思想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二是关于史学工作方

①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版，第 394～395 页。